



我心中的红色经典

经典回放

油画《遵义会议》以独特的构图形式，描绘了遵义会议开始前，20位参会者不同神态、内心各异的情景。画面中，每个人物形象的边缘线都非常深，如刀刻的痕迹，具有雕塑感。毛泽东虽然位于画面左侧，但观者一眼就能看到，他的旁边站着周恩来，另一边是张闻天。画面右侧的刘伯承看向毛泽东的角度，使人物之间既有呼应，又有动静差异，整个画面既有变化，又和谐统一。在周恩来另一边，博古正拿着文件苦苦思索，李德则被安排在会场的旁边。从人物位置安排来看，《遵义会议》看似描绘的是会议前夕，实则暗含了会议的结果。画面人物身着灰色红军装，使得灰色成为主基调，给人以肃穆而深刻的印象。

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画家沈尧伊创作的一系列以长征为主题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再次受到关注，尤其是他从1994年开始创作的代表作——油画《遵义会议》。画作全面、真实、深刻地再现了遵义会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是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经典。

为进一步了解这部作品，我专程赴京郊宋庄拜访沈先生，就油画《遵

油画《遵义会议》

以人民视角还原历史场景

黄华三

遵义会议》的创作缘起、构思、表现方法等向他请教。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对于当代画家而言，隔着时间



《遵义会议》(油画) 沈尧伊绘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河去探求过往的革命史，难免是在一种模糊的视线中观察、研究与发掘。历史画创作需要借助史料、历史遗存等，调动画家的创造性，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事件、人物关系，对历史进行梳理和发现。

创作《遵义会议》时，沈尧伊的身份不仅是画家，还要做党史专家。当时，他所面临的困难不仅是史料匮乏，而且几乎没有任何图像资料可供参考。创作中，沈尧伊既要做到真实还原，又要在作品中凸显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还要考虑作品的审美价值，难度不言而喻。

为此，沈尧伊不断从文献、历史资料、回忆录中寻找遵义会议的相关信息。他多次深入遵义地区，拜访老一辈革命家，进一步熟悉人物形象和他们的性格特点，还对会议召开时的室内外环境、家具、用品等一一进行考证。在此基础上，他绘制了创作草图，向当时健在的遵义会议与会者求证、听取意见，厘清了有关遵义会议的线索，逐渐拼缀起遵义会议的历史场景。

画家把四路红军长征的行进路线作为纵向线索，以俯视的角度远距离观察历史全局；同时以人民心中对长征的历史记忆为横向线索，在纵横交错的历史素材中梳理出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与事件，深刻理解遵义会议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

折点的意义。事实上，沈尧伊创作《遵义会议》的初衷，正是要从人民的视角出发，力图在艺术作品中还原人民认同的历史真相。

在此过程中，沈尧伊逐渐成了一位研究长征的专家，聚焦会议召开前与会者群像的艺术构思也逐渐成形。

以美术作品表现会议场景历来是画家创作的难点。以正常的透视关系来表现围坐的参会者，必定会出现部分人物的背影。最终，20位参会代表在油画《遵义会议》中以一种散落有致的构图呈现，人物形象动态自然且符合个性特征。

正如艺术家姜维朴在《喜见沈尧伊油画新作——遵义会议》一文中所言：“经过缜密研究和艺术构思，把他们不同的内心世界突出地表现出来，画家选择了即将开会这样的场景，就可以使人物之间的关系有更多变化，人物的神态更活跃起来。”

油画《遵义会议》能够从同时期大量美术创作中脱颖而出，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幅作品所展现出的高超绘画能力。

对历史画创作者而言，人物造型的提炼与概括是非常重要的专业素养。既要追求高层次的审美，又要创作出符合大众认知的历史人物形象，就不能只是简单地复制历史图片，而应凭借画家坚实的造型能力进行艺术加工与再现。

《遵义会议》作为经典的“有情节群像”的作品，在人物形象的处理上特别注重刻画中国人内敛、含蓄的个性特征。

为此，沈尧伊刻意回避了一般艺术作品中表现伟人的概念化姿态。在访谈过程中，沈尧伊指着《遵义会议》中的人物说：“这20个人物的确定，在历史上是站得住脚的。每个人物的姿态与形象都不是凭空想象的，都是经过查阅他们不同时期的照片，悉心揣摩每个人物的造型特征与个性神采，最终反复推敲绘制而成。”他表示，尤其是毛泽东从烟盒取烟的这个动作，暗含了蓄势待发、“扬眉剑出鞘”之意，含蓄地表达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遵义会议后得到确立的史实。

此外，《遵义会议》选择“减法”来设置画面的色彩基调也是历史画的一项创新，既还原了遵义会议朴素、真实的场景，忠实于历史，又烘托出长征中复杂形势下凝重的历史氛围。

在沈尧伊的《遵义会议》之前，表现遵义会议的美术作品一般都避开了会议场景这个难题。因此，油画《遵义会议》不仅填补了中国革命历史画的一项空白，也为了解中国共产党党史贡献了一个重要场景的历史画面。

我认识沈尧伊先生已20余年，在他退休后面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但每次见到他，都能在谈笑间深切地感受到他对革命历史宏大叙事的情怀和责

任感。

从青年时创作《而今迈步从头越》《革命理想高于天》，到《地球的红飘带》《遵义会议》等大家耳熟能详的代表性作品问世，今天的沈尧伊虽然已近80高龄，依然笔耕不辍。每次去沈尧伊的工作室，总能见到他正在创作巨幅新作。谈及持续几十年的创作激情，他总是淡淡地说：“我就是喜欢画画，我也只会画画。”

《遵义会议》等长征系列作品的创作历程，向我们展示了沈尧伊一生做好一件事，用一辈子研究长征、表现长征的追求。这种创作精神给予今天的美术创作者深刻的启示。艺术家创作作品的方式与他们所创造的作品同样重要，不为潮流所动的定力与坚守，正是我从沈尧伊的创作中获得的启示。

拜访沈尧伊先生的那个下午，在进入他工作室的一瞬间，我就被眼前一幅他刚刚完成的新作品点亮，视线始终无法移开。整个下午，或愉快对谈，或侧耳倾听，我沉浸在他生动讲述红军长征途中筚路蓝缕、砥砺前行

的历史情景中。我真切感受到了一位老艺术家身上所散发的创作热忱与艺术温度，祝愿他能够继续为国家、为时代留下更为丰厚的视觉形象和精神印记。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

老艺术家聚首再话《东方红》

曾宪秋

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首演，次年被拍成电影，演员达3500多人，观众数以亿计，不仅创造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奇迹，也成为一代代中国人挥之不去的集体记忆。57年后，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致敬经典·艺术里的红色记忆”系列公益活动第二场暨首场文化沙龙“话说《东方红》”在国家图书馆艺术中心举行，当年参加《东方红》演出的李光羲、林中华、赵青、才旦卓玛、邓玉华5位老艺术家相聚一堂，以对话形式分享这部经典巨作创作、排练、演出过程中的难忘故事，千余名读者参加活动。

伴随着电影《东方红》中恢弘雄壮的乐曲响起，5位老艺术家年轻时的影像轮番登场，瞬间带领大家重回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亲爱的同志们啊！你可曾记得，在那战火纷飞黎明，在那风雪弥漫的夜晚，我们是怎样地向往啊，向往着胜利的一天！”1964年，33岁的林中华在《东方红》中担任朗诵主持，如今90岁的他依然嗓音洪亮、思路清晰，现场为观众朗诵了《东方红》中的经典诗句。他清晰地记得当年骑着自行车前往西苑旅行社面试的情景，“我当时准备了《长征》和《黄河大合唱》两首诗朗诵，内心非常激动和忐忑。”他深情地感叹道：“我一辈子只穿过一套衣服，就是军装；一辈子只做过一件事，就是用声音歌颂党、歌颂祖国

和人民。”5位艺术家中最年长的李光羲已92岁高龄，曾在《东方红》中演唱著名抗战歌曲《松花江上》。他说：“3000多人在一起，从排练到演出，大家都怀着满满的荣誉感、责任感。这是一次难忘的艺术教育、专业教育和人品教育。”在《东方红》中一展歌喉的还有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今年84岁的她因演唱《唱支山歌给党听》而家喻户晓。为了将自己的心情分享给大家，她专程从成都飞来北京。才旦卓玛表示，自己亲身经历了西藏民主改革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少数民族演员代表参演《东方红》非常荣幸，更加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和祖国的伟大。

“五彩云霞空中飘，天上飞来金丝鸟。”这是《东方红》中一首反映红军和彝族人民鱼水深情的插曲《情深谊长》，表达了红军到来时彝族同胞的喜悦心情。这首插曲由歌唱家邓玉华演唱，她回忆说：“在此之前哪有主演跳舞的呢？这就是《东方红》的作风，就像雷锋所说的‘螺丝钉’精神。”邓玉华对此也有同感，她说：“参加《东方红》的演出让我深受教育和感染，几乎每一场都会感动落泪。”



活动中，邓玉华（中）和读者合唱《一起演唱《情深谊长》》。汪凯戈摄

中国电影人要善于把生活中的史诗性元素转化为富有张力、富有内涵的电影好故事，用电影化的方式智慧地讲好故事，创作出高质量的电影作品，不断实现电影产业发展的提质增效，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中国电影从大国走向强国。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评论电影《悬崖之上》时说

与其说水彩画专业的艺术可以在大美术中得以确认，我更加认同作品的品格与当代性的表达是隐藏于水彩艺术家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之中的。它可能是一种自我精神的表达，也可能是对水彩专业、方法论及逻辑性的实验诉求，或是对水彩专业美学价值的探索，它是内在的、丰富的，告诫我们中国水彩专业教育不止于“水彩”，当有更深远的意义。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陈坚谈中国“学院水彩”的品格

评书看似是很简单的艺术，一个人表演，道具不多，但绝不能简单化理解。千万不能把说书简单理解为只要有张嘴、有个好使的脑子、能背词儿、把故事捋明白了，就能混饭吃。说书难就难在你要说话，一个人说得要像电视剧一样。所以说，评书是营造想象的表现体系。这种虚拟表演，就是在有限的空间里创造出无限的故事来。

——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田连元谈评书艺术

“意义的深度”是衡量作品美学价值高下的一个尺度，也是有可能成为“经典”的价值基础。“深度”意味着一种生产性的意义，它全然不同于意义消费，或只有消费性意义。“红色经典”要以文艺力量为大众的精神消费注入阳刚因素，使大众在精神蕴含和精神力量上有了新的拓展与成长。

——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范玉刚谈“红色文艺经典”的现代性内涵（邹金涛整理）



《敦煌女儿》舞台照 上海沪剧院供图

随着风铃声响起，舞台大幕开启，西北大漠风情扑面而来，耳畔响起的却是吴依软语的“上海声音”。近日，大型沪剧《敦煌女儿》在北京国家大剧院精彩上演，讲述了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守望莫高窟半个世纪的故事。在两个多小时的演出中，观众跟随剧中人物穿越时空，共同走近樊锦诗致力莫高窟文物修复和保护的一生，也了解到常书鸿、段文杰等几代敦煌莫高窟守护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故事。

樊锦诗成长于上海，却在异常艰苦的戈壁大漠敦煌一待就是半个多世纪。10年前，一篇关于樊锦诗“甘愿用生命守护敦煌”的报道深深打动了上海沪剧院院长茅善玉，她决心将这位“上海女儿”“敦煌女儿”的故事呈现在沪剧舞台上。“从田头山歌、本滩、申曲到沪剧，沪剧的发展始终与上海这座城市一样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在求新求变中与时代同步、与城市同行。我们希望通过塑造当代人物反映时代精神，拓展沪剧的表现空间和受众群体。”茅善玉说。

从萌生想法到创排，历经多年、数易其稿，茅善玉先后带领主创团队8次深入敦煌采风，在边演边改的过程中召开了10余次专家研讨会，收集了数百份观众调查问卷，不断打磨，最终成就了这部“十年磨

一戏”的《敦煌女儿》。此次呈现在国家大剧院的《敦煌女儿》，与此前相比减掉了一些旁枝细叶，显得更为酣畅和饱满。在演出70多场后，身为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获得者的茅善玉与人物也更完美地交融在一起，表演更为精湛纯熟。在时空交错的场景中，茅善玉一个转身便完成了25岁到80岁的转换，配合舞蹈化的肢体语言，表演丝丝入扣。她根据人物不同年龄和情境设计的唱腔，不仅保留了沪剧的细腻温婉，还融入京剧、越剧、黄梅戏、锡剧的唱腔特色，让整体演唱充满力度，人物表现富有张力。此外，钱思剑饰演的彭金章、凌月刚饰演的常书鸿、吴争光饰演的段文杰的舞台表演真挚感人，将筑梦敦煌路上的一个个鲜活人物立于舞台。

演出结束后，观众们无不深深被感染，用一次次雷鸣般的掌声和热情的欢呼声表达对“敦煌女儿”及一代代莫高窟守护者的崇高敬意。有观众表示，舞台上悬挂的飞天形象勾勒出敦煌壁画的背景，莫高窟里的禅定佛形象，呼应了樊锦诗脚踏实地的坚守，简洁而又充满诗意，一下子把大家带到了西北大漠之中，更好地衬托了“守一不移”的敦煌精神。

“《敦煌女儿》之所以受到观众认可，是因为一代代敦煌人从青春到白发，追求理

想、坚持理想，带给我们启示与共鸣。”茅善玉说。她介绍，《敦煌女儿》近些年来频频走入高校，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演出多场，收获不少年轻观众的关注和喜爱，很多学生因看了这部剧，了解了沪剧、喜欢上了沪剧。

《敦煌女儿》不仅让更多人感受到沪剧的魅力，作品本身也给沪剧的发展带来积极影响。“用戏曲表现当代人物是很难的。在这部戏中，我们对音乐扩容，加入了一定的舞蹈化、程式化动作，加强了沪剧的表现力，发掘了沪剧的更多可能。”茅善玉表示。



「上海声音」讲述「敦煌女儿」

本报记者 郑娜